

# 知识背景与中国发展研究的走向

吴忠民

发展研究正在成为我国学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发展研究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元发展研究、分支发展研究、具体发展研究。然而，我国社会现阶段知识背景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研究的走向。宏观思辨型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的学术习风、实证性研究的薄弱，等等，都会在开展、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研究学术体系上发生不同的变异和作用。知识背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发展研究的发展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作者：吴忠民，男，1959年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毫无疑问，发展研究正在成为我国学界新的热点。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学界新热点的形成有赖于两个相关条件的同时具备。一个条件是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另一个条件则是学界热点演进线索合乎逻辑的发展。由是观之，目前我国学界发展研究热的出现并非偶然之事。

从现实社会的需要方面来看，处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亟需发展理论的解释与指导。自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与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现代化问题不仅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愈来愈开始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深层。但是，就社会科学的现状来说，尚缺乏一种学科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给予贴切的解释和有效的指导。现实的迫切需要，必定会促成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兴盛，而且，由于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还将保证发展研究持久而深入的发展下去。

从学界热点的演进线索来看，发展研究热得以出现的必要铺垫已经具备。70年代末有关思想解放、真理标准的讨论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尽管严格地说它并非学术研究本身，但它有助于人们在思想上挣脱束缚，造成一种有益于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环境。相继而来的是“新技术革命热”和“文化热”。两者表现出一种对于未来前景的热切憧憬和对于历史的一种深刻反思，但情绪化的成分往往要大于理智化的成分。其中，前者与中国的现状相距较远，难与中国的国情形成有效的结合；后者则由于研究者各自学科及概念的限制，再加上单独的文化讨论难免与现实有些隔膜等原因，故而热劲过了两年左右便开始冷却。不久，带有强烈现实色彩的“国际大循环经济论”出台，造成了一个新热点。但由于这一理论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界的某个领域，再加上国内改革与发展形势的变化，结果，时间不长，这一热点也开始趋于冷却。十几年以来的学界热点演变脉络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焦点愈来愈指向、贴向发展问题。从客观上讲，这就为发展研究热的兴起做了一番必要的铺垫。

所谓发展研究，是指围绕着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而形成的一个科学群。<sup>①</sup>大致的讲，发展研

① 所谓“发展”有两层涵义，一般意义(广义)上的发展等同于“进步”，“递进”，特定意义(狭义)上的发展则专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目前“发展研究”所说的发展是指后者。

究是由三部分内容所构成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元发展研究”，亦即发展学。其主要研究内容是：(1)关于发展的基本目标与结果即现代性的研究。包括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现代社会的具体指标等内容；(2)关于现代化过程(发展过程)的研究。包括现代化过程的各个具体阶段、现代化起飞的条件、现代化过程中特有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二元化结构)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研究；(3)关于发展类型(现代类型)的研究。包括影响发展类型的主要变项因素(如自然条件、历史基础、民族传统以及社会制度等)，以及这些变项要素的组合方式与规律。(4)关于发展的理想模型的研究。发展研究的第二部分内容“分支发展研究”，这主要是指围绕着发展学而形成的相关性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等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史学、未来学、发展战略学以及区域规划学等等。发展研究的第三部分内容是“具体发展研究”，主要是指对于实际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发展研究的前述三部分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必要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后者则从各自独特角度以及从某些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丰富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

显然，发展研究具有着跨学科的属性。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涉及到国别性发展模式的比较问题，以及现代化各个阶段的比较问题。发展研究要涉及到许多重要学科，如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法学以及历史学等等。正因为如此，发展研究同整个知识背景息息相关。知识背景总体状况如何，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发展研究具体的走向。

知识环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社会现实环境所制约的。一般来说，知识环境在某个时期的基本指向与基本风格是由社会现实环境所规定的。但知识环境也并非完全被动之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不会随着社会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即刻作出相应的变化与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环境对于发展研究的影响才具有着实际的和相对确定的意义。知识环境对于发展研究的影响一是来自某个时期所存在的许多重要学科各自所特有的知识内容、分析方法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这里，既定的占据重要位置的学科就必定会对发展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来自知识环境中的各个学科所共同形成的一种联动效应。知识环境里各个学科的集合具有着非加合性的色彩。知识环境所包含的重要学科，以及知识环境的非加合性色彩，共同形成了知识界某个时期所特有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以及学术风气。这种学术风格、学术传统以及学术风气，对于发展研究这一学科群的主要结构、目标取向以及分析角度、分析方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既可造成某些特有的有效生长点及有益的特色，也可同时造成某些特有的不利之处与隐忧。

## 二

中国的知识界，具有着自己一些特有的学术风格与学术传统，如，近几十年来所形成的重视宏观理论的学术风格，以及历史上所形成的重视人文研究，以及重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受其影响，中国的发展研究在近期将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色，换言之，中国的发展研究将会有一些独特的生长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研究在宏观理论方面将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突进势头。

长期以来，相对而言，中国知识界比较重视思辨型的理论。虽然这种风格并不一定总是能够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使这种思辨性的学术风格的立足点放在现代化研究方面，

则往往会形成许多优势,使发展研究在这样几个宏观理论方面得到明显的进展:

第一,关于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研究。应当承认,我国知识界有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传统。对于发展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于片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斗争的学说”,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学说”。现在,全力以赴从事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全国民众包括知识界的共识。对于知识界来说,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化方面的理论势必会成为一种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确乎大有挖掘的余地。同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化的论述显然要高出一筹。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大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世界整体(世界历史);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融现代化的现实与将来于一体,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趋向也进行了必要的把握。如果我们能够顺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代化理论的思路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并且,如果能够准确地总结世界现代化过程新的经验的话,那么,对于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研究很快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果。

第二,关于合理发展模型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本身也是物质的力量,具有一定的被动自发性,具有自己特定的发展的多种潜在指向。这些潜在指向有的与人的需要是一致的,有的就不见得一致了。后者若不加以必要的控制,就有可能给社会、给人类带来负作用。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忽视了。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由于对大工业的盲目崇拜,由于线性思维方式的简单性,人们往往把现代化当作是一种以经济为本位的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把人及社会当成经济的附属物。无论是先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还是诸如拉美等国的现代化过程,都已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造成人的异化、贫富两极分化、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污染等弊端。中国知识界具有重视人文的传统,而且,近年来知识界对于人及社会的主体性问题尤为关注,所以,这就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重视有关现代化过程定向问题的研究。有关发展的定向研究势必会强调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从而突破传统的以经济为本位的发展观。有关发展定向这一前提性的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发展研究将会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注重如何建构合理发展模型的问题。在建构合理发展模型时,还会考虑到中国几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包括纯理想化发展模型的失误,从而注重新发展模式的可操作性问题。如发展的整体有机性问题、内生与开放相结合的问题、畅通性问题、调适性问题。这样看来,就合理发展模型的建构而言,中国的发展研究在近期内是会有重大建树的。

第三,关于后现代社会的研究。后现代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寻求如何继续完善的问题。本来,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离后现代社会尚远。但是,由于这样几个原因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可能比较注重后现代社会问题。在前现代社会或是后现代社会,哲学一类的思辨性学科,都会占据着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由于这两种社会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还由于这两种社会里人们心理上的“从容”。正是由于这种“相通”,再加上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跨度很大,所以,中国知识界里的哲学思辨传统便很容易使发展研究比较关注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再者,近十年来,未来学在中国开始兴起,由于它所表达的往往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憧憬与向往,于是,这就加重了发展研究初始阶段研究者们对于未来的后现代社会的关注。这样看来,中国发展研究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后现代社会的研究比较投入,并相应地会形成一些有关成果。但是,随着实际发展进程的深入,社会必定会愈来愈要求发展研究能够提供一些可行的、可兑现的成果。这样,中国发展研究中的有关后现代

社会的研究就会日益显得与现实社会存在隔膜,因而会相对冷却下来。

(二)发展研究在类型化方面也会有重要进展。

发展的类型化亦即发展模式的研究在发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使发展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精确化,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由纯发展理论的研究向操作化的发展战略研究过渡的必要环节。而就发展的类型化研究而言,我国知识界具有着不小的优势。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一直比较发达,十年以来的文化研究也已初具规模,况且,这两个领域一直在寻找进一步突破的出路,寻求与现实社会研究形成有效结合的途径。发展研究恰好同这一要求相一致。这样,一方面,历史研究及文化研究领域里许多已有的一些有关成果可以直接有助于发展的类型化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这两个领域还可以围绕着发展问题继续形成一些有关的成果。再者,我国的理论思辨风格也将有助于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比较研究。另外,近年来在我国知识界开始出现的实证性的学术风格也将对发展的类型化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基于这些条件,可以预计,我国的发展研究在类型化方面将有不小的进展。

发展的类型化研究首先会在发展类型得以确立的基础性条件亦即影响发展进程的变项因素方面有明显收获。影响发展进程的变项因素是很多的,不过就其主要变项因素而言无非有三项,一是民族传统,二是历史基础,三是自然条件。中国现有的知识背景,有助于发展研究在这三项因素方面的进展:(1)有关民族传统对发展类型影响研究的进展。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逐渐发觉,民族传统在形成之初,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很大。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着自己的相对稳定性。民族传统并非时代内容本身,而是某种超越时代的东西,其本身并不显现出一种“发展”的状况,只能说,它是每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民族的某种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内在规定系统和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模式中的具体结构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现代化模式具有一些区域性特征。这方面较有深度的研究,在别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研究中只有少数研究者才能做到,而且是近十几年来才能做到。而在我国发展研究中,一开始就很容易在这方面形成一种共识。不能不说这同我国发展研究的特有知识背景有着直接关系。(2)有关历史基础对发展类型研究的进展。各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极不相同,于是,复杂的历史基础便会对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使得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更加多样化。就这方面的研究而言,我国的历史学学科,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这非常有利于我国的发展研究及时汲取国外学界有关历史基础对发展类型影响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和突破。(3)有关自然条件对于发展类型研究的进展。自然条件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环境、人口以及国家规模的具体状况等等。一个国家自然条件的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具体的发展道路。近年来,随着国内知识界实证学风初步兴起,国情研究热也开始形成。这种情况对于有关自然条件与发展类型关系的研究非常有利,有助于使之较快、较好地上一个台阶。

发展的类型化研究的进展将会突出表现在有关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方面的研究。在研究影响发展进程的主要变项因素的基础之上,有关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的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会有重要收获:(1)中国现代化模式在民族性特色方面的研究。比如,通过中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模式的比较研究,不难形成这样一些看法:受不同的民族传统的影响,中西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差别很大。就现代化的推进而言,西方社会容易倾向于不断地重建,而中国社会则更容易倾向于逐渐转型;就现代化的动力源而言,西方社会侧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中国社会则侧重以群体为基本单元;就现代化约制机制而言,西方社会强调一种纯粹的法治,中国

社会则注重法治与德治的并用。(2)中国现代化模式在时序方面特色的研究。由不同的历史基础所引致,同发达国家相比,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二元结构明显;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经济波动幅度比较大;变异现象严重;可资借鉴经验丰富;重视国家发动等等。(3)中国现代化模式在“先天性”方面特色的研究。由种种自然条件所规定,同一些中小国家相比较,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劣势,如:综合国力容易迅速增强;发展潜力大,回旋余地广阔;有利于大型工程的建设;容易形成发展本身较大的惯性;注重节约型的发展战略;内涵型发展艰难;社会控制系统本身更容易出现故障,利益方面的制约力过多等等。

(三)在许多有关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会有重大进展。

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界有着经世致用的实用传统。就发展研究而言,实用型的学术传统可以在不小的程度上起着一种有益的推进作用。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去关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而使发展研究最大限度地对于实际发展进程产生指导作用。

毫无疑问,围绕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而带来的种种社会效应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热点。长期以来,在产品经济条件之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工具(主要指生产力范围的事物)的现代化与社会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一种分离的状态,前者相对来说被高扬,而后者相对来说则被压抑。这种分离性进一步引发了种种弊端。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将会改变这种情形,使二者趋于融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意味着社会整体化的转型。在这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价值体系紊乱、社会控制力减弱、贫富两极分化、文化建设迟滞、通货膨胀、社会心理不适等等。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并寻求到合理而有效的对策,便成为发展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发展研究与现实经济直接挂钩的分支研究即发展经济学将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发展研究中的诸项分支研究中,发展经济学同现实的联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发展速度在近期内将超过其他分支研究的进展。具体到发展经济学本身来说,这样一些内容将引起人们的关注:财政、货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优先次序选择问题,资本的形成问题,经济发展的基本推进方式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经济增长阶段与经济增长限度问题;利用国外资源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问题,农业发展的地位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等等。

发展研究与现实联系较为密切的一些问题也将得到人们重视,这包括:(1)社会指标体系(包括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2)城市化问题(包括小城镇发展问题);(3)社会保险问题;(4)社区服务问题;(5)第三产业发展问题;(6)某些与重大决策直接挂钩的大型项目的研究,如围绕着三峡工程所带来种种问题的研究。

这样看来,只要中国的发展研究能够正常、健康地进行下去,就不难形成一种既有深度、又有特色的中国发展研究流派。

### 三

毋庸讳言,中国知识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对于发展研究的正常进行,具有不利影响。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一种急功近利、浮躁的风气。知识界并非象牙之塔,而是同整个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由于人们对于1978年以前那种禁欲主义束缚的挣脱而形成的一种过度反弹,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极为看重经济效益以及个人利益的极端功利化的行为取向。再者,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同其他许多阶层相比呈下降趋势。这些,

对于知识界的学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知识界由此而产生的急功近利与浮躁的风气,对于发展研究的进行是不利的。这种风气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研究取向上的“泛经济效益化”,一切寻求立竿见影。于是,基础研究便被程度不同地看轻了。而发展研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综合。基础研究的某种虚脱,势必会使整个发展研究的水准受到影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风气,还会直接对研究者本身产生不良的影响,使之在研究中的实际投入量减小。

中国知识界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社会科学结构本身的不合理。这对发展研究的深入进行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应当承认,在我国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的渗透远远不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形成有效的结合。这种情形导致了我国社会科学里实证研究方法的薄弱,所占比重过小。这不能不进而减弱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可操作性。而发展研究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应用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各学科之间的比重极不平衡,即:过于偏重文、史、哲等学科,而相对看轻社会学、法学、文化学、未来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等。作为综合性的科学群,发展研究需要多种学科的支撑。另外,中国的知识背景中还存在着一种“二元化”的现象,即:知识背景中的整合度不够、同一性较弱。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处在一个急剧更新的时期,因而难免出现新旧概念混乱、新旧研究方法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二元化”的状态很不利于发展研究的规范化。

在发展研究刚起步之时,中国知识背景中的优势有助于发展研究在宏观构架以及部分具体内容取得较大的进展。继之,待发展研究要进一步深入、规范化的时候,知识背景中的上述不足便会对其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造成某些不利的诱导。

同发展研究的宏观层次亦即元发展研究(发展学),以及具体层次亦即具体发展研究相比较,发展研究的中观层次亦即分支研究,在近时将呈弱势。对此不难理解。受学术界重视宏观理论传统、人文传统以及务实传统的影响,发展研究中的宏观层次以及具体层次的研究在发展研究刚起步时,将呈较盛状态。发展的分支研究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以及实证学风的联系较为密切,而中国目前这些学科比较薄弱、尚未成熟,再说,从总体上看实证学风尚未形成,因此发展的分支研究(中观研究)也就难免一时薄弱。必须看到,在整个发展研究中,中观层次的研究(分支发展研究)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的薄弱将会妨碍其他两个领域的进一步开展:其一,元发展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化。分支发展研究是从许多重要的侧面对发展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宏观发展理论必然汲取分支发展研究的成果。否则,就会脱离必要的基石,就必定会陷于过度“玄思”的状态之中,而谈不上进一步演化与规范化的问题了。其二,具体发展研究也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不通过分支发展研究,具体发展研究难以同宏观发展研究直接形成有效的结合。因为,宏观发展研究本身的抽象度过高,难以直接成为具体发展研究的依据。既然不同宏观发展研究与分支发展研究相结合,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具体发展研究也就缺少了归属感。面对着众多的现实问题,这时的具体发展研究的随机性也就难免过强,所涉及的问题过于庞杂。这样,不但降低了自身的研究深度,而且,也冲淡了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贸然形成发展战略,那么,这种战略必定会由于缺乏周密性和配套性,而没有持久稳定性。发展战略的频繁变更,意味着人们的建设活动在不断地浪费,及现代化进程的不规则推进。

发展研究在初始阶段,很容易出现两种有害的倾向:一是盲目照搬国外现成的发展研究成果,而忽视了中国发展研究的特色;二是过于强调本国发展研究的特色,而程度不同地忽略了发展问题的普遍性通则。特色固然重要,但是,除了某些先天的、某些超越时代的特色(如民族

传统)之外,大部分“特色”性的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更新或是被新的“特色”取代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的推进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又会形成新的特色。对于特色问题,我们还应看到,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的“特色”并不一定就等于根本性的优势。人们可以运用许多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推动本国家的发展,从而形成许多“特色”。这里,发展水准如何,才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特色,而其他事物大都是些次要性的特色。对于本国的“特色”问题,不应盲目固守,不应成为拒绝汲取别的国家先进事物的借口。

我国的发展研究在刚起步时,比较容易出现盲目过热的情形,在急功近利学风的影响之下,人们往往共同迅速趋向某个研究领域,一哄而上,“热”得很快。这种表面上的热潮如若不及时地给予合理的导向,就有可能造成种种不利的影晌。不能否认的是,我国从事发展研究的学人大都出身于别的学科,特别是偏重于文史哲学科。这样,研究者所具有的思路、所使用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发展研究领域里的讨论往往是各说各的,难以真正地交流,更谈不上相互促进了。题目的分散,不利于发展研究的有效进展;而学科认同性的薄弱,又不利于发展研究的规范化。

#### 四

中国发展研究的理想成果显然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流派。这种流派应当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的功能:(1)确立起中国发展的合理模型;(2)归纳出中国发展的基本类型,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得到充分的、体系化的论证和确认;(3)制定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并能为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性方案。

如何才能有效地促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研究流派的形成?除了发展研究领域注意规范化、学科化建设、及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之外,知识界所能够做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重视知识背景的优化。

知识背景并非固定不变之物,而是具有着一定的可塑性。具体到知识背景与发展研究的关系而言,尽管知识背景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发展研究的具体走向,但是发展研究对于知识背景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背景也有着一定的重塑作用。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一条重要规律,这就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往往会有一门或一组主导性的学科走在别的学科之前,并促进着它们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研究是目前社会科学界的带头学科。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研究涉及面很广,它不仅涉及到历史学、哲学,还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文化学等等。因此,发展研究的发展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契机。回顾近十几年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涉及面较广的研究热潮总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走上一个新台阶,如,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造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消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许多障碍;文化研究热潮则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更新问题。而发展研究的这种功效恐怕会更为明显。发展研究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各学科协调发展,重视汲取自然科学界的一些合理、有效的观点与方法,重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科学的结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趋于合理化,从而最终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张宛丽